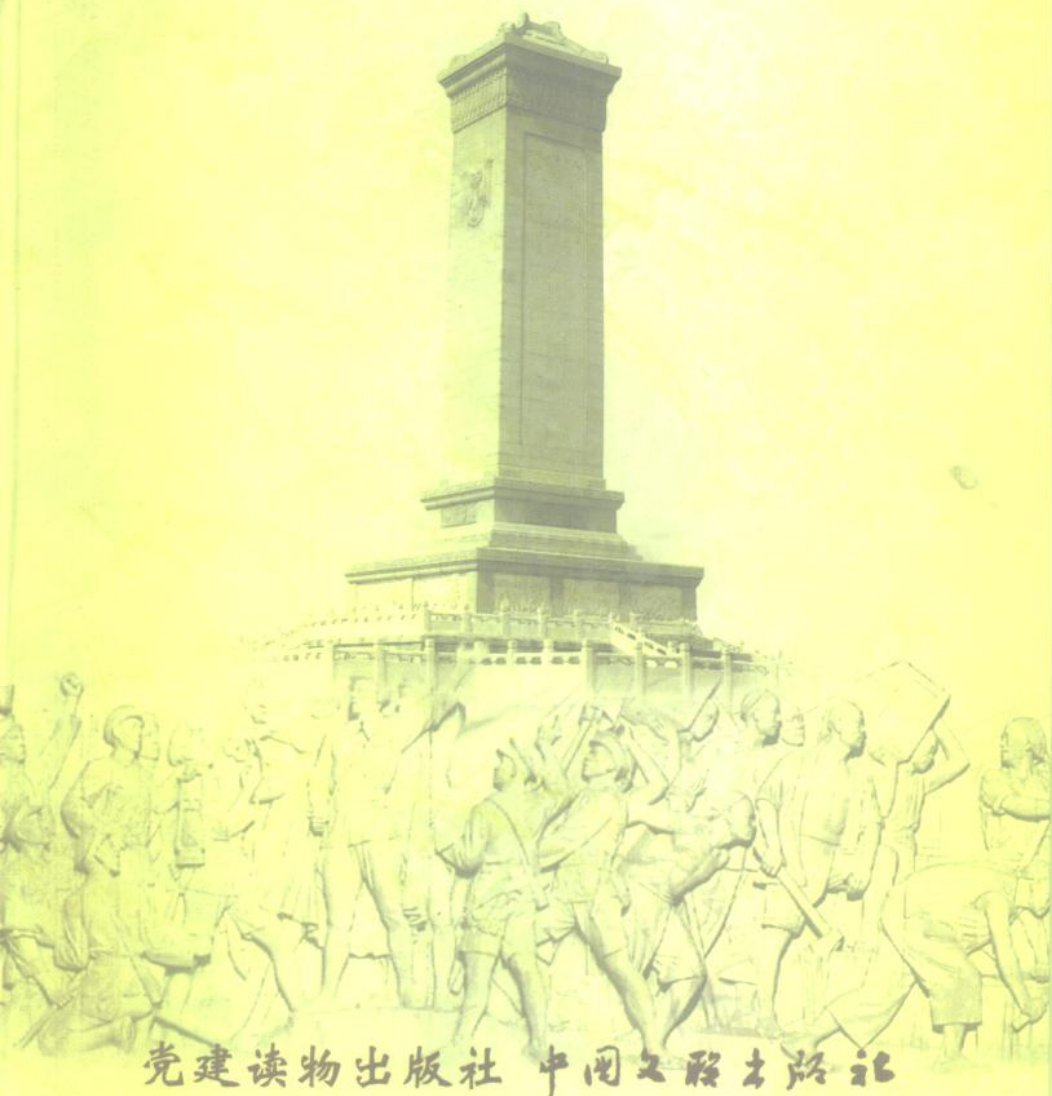


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第二卷

《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第二卷

《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二卷·目录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	李志民 (1)
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	陈伯钧 (29)
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	聂荣臻 (45)
关于通道转兵的一些情况·····	罗 明 (51)
遵义会议前后·····	伍修权 (53)
夜渡金沙·····	黄新廷 (61)
难忘的草地征程·····	裴周玉 (70)
我在西北经历的三次红军大会师·····	陈鹤桥 (77)
记西路军历史的最后一页·····	刘 琦 (87)
记“一二·九”运动·····	彭 涛 (94)
山东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黎 玉 (99)
30年代中共东京支部的成长历程·····	陈 健 梁威林 (127)
洛川会谈前后·····	钱之光 (136)
西安事变前后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回忆·····	刘培植 (149)
争取杨虎城十七路军的谈判经过·····	汪 锋 (167)
艳晚事件·····	宋 黎 (179)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孔从洲 (195)
回忆我党在杨虎城部三十八军的工作·····	蒙定军 (238)
回忆在西安办事处的工作·····	孔石泉 (262)
我所了解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	钱之光 (267)
追忆平型关血战·····	孙 毅 (286)
关于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斗争·····	薄一波 (293)

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回忆山西抗战	任弼时 (306)
我当牺盟会特派员的回忆	曹 诚 (319)
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工作	马文瑞 (331)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	林伯渠 (353)
延安时期的“赵占魁运动”	杨长春 (385)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反磨擦斗争	耿 飏 贺晋年 (396)
皖南惨变记	钱俊瑞 (416)
皖南事变与周恩来的领导艺术	陈舜尧 (502)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的关系	黄火青 (538)
在新疆工作的回顾	黄火青 (549)
新疆监狱斗争中的通讯联络工作	刘护平 (554)
突破日军的“铁壁合围”	曾思玉 (563)

2150/04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 深刻教训

李志民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过“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过去，人们往往以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其实，“左”和右的倾向都是错误的，都给我们党和军队造成过很大的危害与损失。尤其是“左”倾冒险主义，拉起革命的大旗，喊着革命的口号，带有更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因而对全党的统治时间更长，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更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东方军的经验教训就是有力的证明。

东方军的组成及其历史背景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我们红一方面军在总前委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与指挥下，连续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1931年底，红军又英勇出击，攻克了许多城镇，缴获敌人大批武器弹药来补充、壮大自己，巩固、扩大了中央苏

区。通过三次反“围剿”作战，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军（包括各个地区的红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指出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十六字诀是1928年提出的，“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4页）

但是，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并未重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们不了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无视敌强我弱、革命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的客观现实，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主观地认为当时苏区已经巩固，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从而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以及“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开灭战”等正确的作战原则，提出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1932年1月9日党的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这种“速胜论”错误思想的指导下，1932年6月20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6月5日的军事训令，作出了《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应迅速地求得赣江流域的连续胜利，以夺取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城市为目的”；并要求闽西苏区“应以主力向闽北发展，造成广大的苏区，与赣东北苏区打通，成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东方一翼”。由于决议通过后不久，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红军主力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

未能入闽去争取江西“东方一翼”的胜利，直到1933年7月才组成“东方军”入闽。

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同，毛泽东同志根据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的新形势，积极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通过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的卖国阴谋，以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同时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仅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而错误地给他加上“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游击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等大帽子，不断排挤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他们借口政府工作的需要，让毛泽东同志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1931年11月初撤销他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下旬，在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苏维埃主席的同时，免除了他的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只安排他为中革军委15名委员中的第12名委员；1932年10月又免去毛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1932年6月，蒋介石亲任“剿共总司令”，出动了五六十万兵力，对我进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开始，敌人对我中央苏区采取守势，首先围攻鄂豫皖、洪湖两根据地，以解除我红军对武汉的威胁。接着，1933年2月，蒋介石又亲自到南昌督战，集中兵力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当时毛泽东同志虽然已离开了红军，但由于作为全党军事经验总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早已深入人心，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红军中还不占主导地位，在直接参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的创建的周恩来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的正确指挥下，每次战斗仍按照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略战术原则进

行，所以连战皆捷，至3月21日就歼灭国民党“进剿”军三个师大部，活捉李明、陈时骥两个师长，歼敌2.8万人，缴枪万余，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战斗中发展到10万人之众。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充分肯定了第四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正确和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第四次“围剿”中的惨败。为此，蒋介石曾手谕陈诚，沮丧地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其狼狈程度可想而知。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白区难以立足，被迫撤到了中央苏区。5月12日，中革军委增加委派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以军委主席朱德同志率第一方面军在前方指挥作战为由，委任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达八个月之久，指挥全国红军，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更直接地在苏区和红军中得以推行。

“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尽管每次胜利都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坚决抵制中央的“左”倾错误指挥的情况下取得的，但这些阿Q却盲目地鼓吹这次胜利是执行他们的“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和实际工作”的结果，从而更助长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左”倾冒险主义在红军中泛滥成灾。王明、博古和项英等人本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特别是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又丝毫不吸收粉碎一、二、三次“围剿”的丰富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实际经验，不调查研究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具体情况，盲目地主观地提出许多“左”的口号，确定了许多不能实现的紧急任务：什么“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打正规战”，“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等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

等，生硬照搬苏联的一套经验。博古等人还竭力依靠、抬高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尤其是1933年10月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之后，博古、项英更是放手让他掌握红军的实际指挥权，使他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从而实际上剥夺了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军事指挥权。

他们提出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就是把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两个主力部队分开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本来从1930年以来，一、三军团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从来没有分开过，并肩作战，拧成一股绳，所向披靡，形成一个无坚不摧的拳头砸向敌人。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决策下，两个主力部队被分割，打击敌人的力量被分散。1933年夏，他们害怕根据地的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以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于江西的宜黄、乐安、南丰一线，正面牵制崇仁、金溪之敌，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使它失去机动灵活歼敌的机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1933年12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又一度以一军团为主改组为“西方军”，节节阻击“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同样失去机动作战的机会）。同时，于1933年7月1日下令，以三军团（暂缺红六师）为主，包括福建的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滕代远同志为政委。为配合作战，还命令红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部分分区的地方武装亦统归彭、滕就近指挥。东方军组成后，7月2日，三军团即率红四、五师由江西广昌的头陂地区出发，分两路经新安、丹溪和驿前、石城向福建进军，于7月5日到达宁化以西地区集结，执行收复闽西沦陷的连城、新泉苏区和开辟闽北新苏区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当时因为没有一军团的协

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同配合，东方军虽然奋力苦战，但孤军奋斗，搞得疲劳不堪，未能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东方军的历史功绩永垂青史

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红一方面军周恩来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的正确领导下，在东方军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滕于1933年12月因病调离后，杨接任政委）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艰苦奋斗，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仍然打了很多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打开了一些城镇，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充了红军，筹集了大量物资，部分地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穿衣、吃盐等等困难。东方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33年7月2日，东方军向福建进军之后，几乎每战都是经过周、朱、彭、滕诸同志与“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在往返电报中反复争论，甚至激烈斗争才取胜的。入闽第一仗是拔除宁化县的泉上土堡。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地处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建宁数县毗邻之处，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个土堡墙高约2丈5尺，厚2丈余，相当坚固；驻有国民党军阀卢兴邦师第三〇七团，并有宁化、清流、石城、长汀四个县的残余地主武装四百多人；储有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数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威胁着附近苏区的安全，也是东方军向东运动、扩大苏区的极大障碍。所以东方军决定首先拔掉这个钉子。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当时心目中只有中心城市，即使一时打不了大城市也要打县城，完全不把小小的泉上土堡放在眼中。所以，他们不顾实际情况，下令东方军首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

先攻打清流县城。

当时的争论，给东方军作战造成极大困难。7月4日，彭、滕电请第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转中革军委项英代主席，提出：“清流、泉上、嵩口仍为卢逆，共四团无变化。首先消灭泉上之敌，后再同时攻击嵩口、清流之敌。此举我有集结主力随时打击增援敌之便。”同时说明，清流城堡坚固，敌人利用天险加修工事，袭击万一不克，要延误时间，再从火线撤下打增援之敌，将影响士气。这些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的战斗部署，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战术原则，很快取得朱、周同意。7月5日，朱、周回电指出：“如敌情无变化，三军团应首袭泉上，占领后迅速取得归化，以一部断嵩口通永安联络，相机截击永安或连城来援之敌。”但是，7月6日项英回电，却极端主观地认为：“对东方军目前的行动，如就来电所云，事实上仅能消灭泉上、归化之敌，即转移北上，绝不可能打击连城援敌。”“泉上、归化均属城围，工事虽较清流易攻坚，则我意仍以清流为攻击目标，坚决消灭三团人，连城敌有增援可能，若消灭援敌对东南、西南战线有大影响。”

正当周、朱、彭、滕与项英争论之际，7月9日，卢兴邦部的旅长张兴隆率第三〇九团从清流增援泉上。彭德怀、滕代远同志根据原定“围点打援”的战术原则，除令红五师主力继续包围泉上，努力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外，即令红四师在离泉上30余里的延祥设伏，准备歼灭援敌。

泉上通延祥的小道上，两旁均为高山峻岭，中间是一狭长洼地，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这一天，敌三〇九团刚进入伏击圈，红四师张锡龙师长、彭雪枫政委立即发出攻击命令。红军战士先是从两侧山上居高临下以火力杀伤敌人，然后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只一小时激战，就干净利

落地全歼敌人这个团，无一漏网。接着，红四师乘胜追击，进占清流东北的嵩溪；独立红七师进占清流西北岭下、田背一线；红三十四师进占清流西南的雾阁地区，从而切断了清流与泉上的联系，进一步孤立泉上敌人。同时，红五师第十三团也乘胜东进，歼灭归化守敌一个营，解放了归化城。

延祥伏击战的胜利，为攻克泉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证明“围点打援”战术的正确。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急于要进攻清流和连城守敌，7月10日又电令东方军“只留一团围攻泉上，并由该团抽出一连为基干，领导归化东北游击队，巩固归化”；同时命令主力部队大部分立刻转移到清流南面，准备消灭清流撤退之敌，或配合三十四师打击连城增援清流之敌。

在此情况下，7月11日，朱总司令、周总政委不得不给项英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指出先袭泉上后逼清流才易于打击敌人增援部队，不能采取积极进攻清流域的办法；并指出以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及令红十九师渡将乐河南下都是不妥当的，因目前多雨，山水时涨，闽省各河流急水深，大兵团运动不便，加以天热多病，三军团沿途已留下500百多病员，请项英“决定部队行动稍稍顾及此点”。在另一封电报中转达了彭、滕的意见，力言即刻移兵清流南岸，“围攻泉上巩固归化留一团兵力万万不足，因泉上敌之兵力超过八连人。我主力南移，连（城）敌如不动，清流敌可北向，解泉上围，我成隔岸观火，迂回过河须3天行程，现三军团每日搜山征发，只吃两餐稀饭尤不利这样行动”，并明确表示已复电令彭、滕依预定计划有步骤地争取胜利，要求项英：“请勿急，尤请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们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次日，彭、滕又将围攻泉上、清流、连城的意见电告项英，强调指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

出：“泉上土围敌八个步兵连，机、炮各一连，地主武装百余人（注：后查明有400余人），一团围一团是不够的。况反动的童子军、大刀会会在外面扰乱，因此再无力顾及归化。”在朱、周、彭、滕据理力争下，项英等人才缓和口气，回电朱、周并转彭、滕，解释说：“我迭电你们不是命令，而是提出某一阶段中作战意图……。”但仍软中带硬，固执地坚持己见。

7月14日，在东方军围攻泉上土堡，并接连取得延祥、归化战斗胜利的有利形势下，红三十四师在清流与连城之间的安乐、雾阁一带也积极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切断清流、连城之间的联系。盘踞清流的卢兴邦主力3个团慑于我军的威力，弃城向永安撤退，红三十四师经安乐向秋口截击未获，于雾阁与马屋附近击溃从连城增援清流的敌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个团，乘胜占领了上堡。红四师第十团、十一团和独立七师乘胜进占了流城镇；红四师第十二团亦向嵩口坪、秋口推进，牵制连城守敌。

此时，敌七十八师还有两个团在雾阁附近的四堡。项英获知这一情况，并得悉连城敌人还可能派出三四个团增援四堡的情报，没有通盘考虑整个战局，7月16日便匆忙以“十万火急”电令东方军放弃泉上，立即南下配合三十四师歼灭四堡敌人这两个团，并准备歼灭连城援敌三四个团，同时严令“部署中应注意不使该两团撤回连城固守，而成相持之势”。

周恩来总政委接到项英这“十万火急”的电令后实在感到为难，马上复电提出意见：“泉敌不应放走，围攻至少要两团（两团无外围敌有突围可能），立即以四团兵力配合三十四师袭击四堡（四堡有工事），打增援队则火力不足。”“调十九师接围泉上，以三军团全部南移则须延迟三天，泉上到四堡三天又恐四堡之敌情有变化。”但周总政委在提出意见的同时，为了

执行军委项英的“十万火急”电令，还是尽最大努力，命令在将乐县白莲地区的红十九师迅即南下，两天以后赶到泉上去接替三军团围攻泉上的任务，以便三军团腾出手来，集中兵力全部南下，同时，命令三军团除留足兵力继续围攻泉上，等待十九师来接围外，其余主力部队立即集中清流，经安乐、雾阁之西，秘密运动，配合三十四师袭击四堡。事实证明，不待我三军团南下，四堡两团敌人早已撤回连城，项英“十万火急”电令只是主观臆想而已。

7月19日拂晓，围攻泉上土堡的红五师第十五团完成了坑道作业，把土硝装在棺材内，推进坑道炸开土堡围墙，趁硝烟弥漫之际，勇猛冲入堡内，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干净利落地全部歼灭守敌一个团。至此，延祥和泉上两战共毙敌400余人，其中团长1人；俘敌1200余人，其中旅、团长各1人，营长3人。缴获步枪1100余支，迫击炮2门，机关枪7挺，驳壳枪60支。此外，俘虏宁化新旧县长2人，宁化、清流、归化等县逃亡地主恶霸及地主武装300余人，缴获大批现款、粮食、食盐等物资。

东方军首战告捷，拔除了泉上土堡，解放了清流、归化两县大片土地，军威大震。为了总结入闽以来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总政委于7月20日特地就“关于打泉上战略部署的争论问题”致项英一封电报，批评项英等人不顾实际情况和可能，连日频频来电，喋喋不休地催促部队攻打清流及南下打连城，并严肃指出：“我们争论并非意图不同，更非不认识主要突击方向或总攻下泉上即应北上与东向”，“我们不同，乃在我们判断连（城）敌援不是如你所料，不主张三军团主力立刻过清流河及南下……而你主张分兵南下，这是战略实施在战术上的问题，须估计到当时当地敌情、地形与我兵力、给养条件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

等，我坚持执行已定步骤（每一步骤是有前后接应的）达到胜利”。周恩来同志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语，对“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主观主义的指挥方式是个有力的批评。这些事实也足以说明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的正确和英明，足以说明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东方军军事上的胜利，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盲目要求扩大战果。他们早在1932年6月27日通过的《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就提出：“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把古田会议确定的红军三大任务缩小成只有打仗一项。所以解放这些地方后，不待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新区，便匆忙命令部队去进攻连城，限时刻到达，并指定必须由北向南进攻。他们坐在江西瑞金，不了解福建连城的实际情况，不接受攻打泉上作战部署争论的教训，仍在那里瞎指挥。

连城、新泉原为我闽西苏区，1933年四五月间被十九路军侵占。所以，当我东方军围攻泉上土堡时，红三十四师及红四师一部分兵力已先后奉命进至连城周围，准备待机收复。

当时十九路军的六十师沈光汉部驻在龙岩至新泉一线；七十八师区寿年部驻在连城及四堡周围；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则驻扎闽中的泉州、永春一带作为机动。区寿年师是这次进犯我闽西苏区的先头主力师，辖两旅六团，师部还配有炮、工、辎重、特务等直属分队，总兵力约万余人。该师全系德式装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数第一流的军队，战斗力较强，又据守着连城强固的野战工事，确是易守难攻。但

项英全然不顾这些实际情况，命令东方军当即攻取连城，并按地图所标示的位置，给东方军划定了由北向南进攻的路线。

那时正值七八月天气，闽西天热如焚。彭德怀同志为弄清敌情，亲自带领侦察排到第一线侦察了一天，发现按项英的规定由北向南进攻连城，我军完全处于仰攻地位，地形对我十分不利，连攻击点也找不到，实在无法完成任务。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距离连城东南约 70 里的莒溪，驻有区寿年师丁荣光的四六七团大部，另以该团之黄康营驻守离莒溪西北 20 里的朋口，守卫龙岩至连城和龙岩至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口要道，作为丁荣光团的前哨营。如果我军选择朋口作为突破口，必然可以调动莒溪及连城之敌出援，在运动中消灭它。但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给前线指挥员一点机动权，谁也不允许改变他们的作战计划。面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滕代远同志以革命利益为重，还是实事求是地将情况电告朱、周转报项英，要求改变作战方案，经过反复争论，才获得批准。

7 月 28 日，我东方军红四师和红十九师分别包围朋口、莒溪守敌，先后发动进攻。红五师和红三十四师则在外围担负牵制连城敌人、打击增援部队的任务。区寿年闻讯马上从连城派出四六六团钟经瑞部火速增援莒溪、朋口。我红五师第十三团早于 29 日清晨就抢占了朋口东侧的高山，控制制高点，敌钟经瑞部也企图争夺这个制高点。红十三团立即以一营迂回敌后，猛烈夹击，将援敌钟经瑞团全部歼灭。接着，全力围歼朋口、莒溪之敌，将敌四六七团丁荣光部和所属黄康营全部歼灭。

8 月 1 日，东方军所属红四师、五师、十九师、三十四师于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欢庆建军六周年。在庆祝大会上，彭德怀司令员和政治部袁国平主任都讲了话，鼓励全军指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

战员继续英勇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当晚还举行庆祝晚会，三军团和各师宣传队演出文艺节目，锣鼓喧天，歌声飞扬，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区寿年得悉其四六六、四六七两团全部被歼，急电请示漳州十九路军总部。十九路军总部恐区师被我全歼，8月2日即电令区师放弃连城撤至永安，并令驻闽中之六十一师毛维寿部派出一个旅赶到大田、永安，掩护区师撤退。8月3日，区师尚存的四个团及师直属部队刚撤至连城县的姑田镇，我东方军红四师、十九师、三十四师追击部队已经赶到，一阵猛打猛冲，区师顿时大乱，纷纷丢弃枪械、行李、辎重，夺路而逃。我军直追到小陶，再歼区师一个团，打得敌人惊慌失措，草木皆兵，一昼夜狂奔170里逃至永安，狼狈不堪。

敌六十师沈光汉部闻讯，恐被我歼灭，迅即从新泉一线缩回龙岩；六十一师毛维寿部驻扎泉州、永春一带，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一仗，我东方军共消灭敌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一个旅三个团，俘敌官兵2000余人，其中旅长1人，团长2人，缴枪2000余支，军粮1500担，对国民党十九路军震动极大。这是十九路军参加反共内战史上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击。从而使该军认识到反共只有自取灭亡，也是以后该军政治上从“反蒋反共抗日”转变为“联共反蒋抗日”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出所料，我东方军攻下朋口后，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连城、新泉苏区，并乘胜追击，开辟了泉上、清流、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完成了第一阶段在闽西的作战任务。东方军利用这个时机在连城进行10天整训，补充兵员，准备执行第二阶段向闽北进军的战斗任务。但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只让部分地方部队开展一些宣传活动，仍不让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巩固胜利成果，8月13日电令主力部队立即